

發展主義的開放邏輯

——中國加入世貿的背後

• 岳健勇

摘要：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經濟增長成為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唯一來源。1990年代，中國政府推行了激進的市場化改革，這種刻意犧牲社會公正的經濟改革造成了空前的腐敗和貧富分化；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基於對「東亞模式」的誤讀，又推行了出口導向與投資自由化相結合的外部整合發展戰略，在刺激出口的同時大幅開放國內市場，為此不惜犧牲國家的自主發展。到1990年代末，改革和發展均遭遇到嚴重困境，以致經濟增長難以為繼。出於對政權合法性的深刻憂慮，中國政府接受了異常苛刻的經濟自由化條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冀望更大規模地增加出口和引進外資，以扭轉經濟的頹勢。

關鍵詞：全球化 市場化改革 中國入世 發展主義 政權合法性

開始於1970年代的改革開放代表着這樣一個進程，即中國不可逆轉地融入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在這一進程中，中國逐漸從一個全球資本主義國際體系的挑戰者轉變為一個利益相關者 (stakeholder)。這一大轉變在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時達到了頂峰。

中國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它衰落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帝國主義時代，而帝國主義時代恰恰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黃金時期。之後，中國再度崛起，但中國的復興並非始於毛澤東治下的革命極端年代，而是冷戰結束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時期。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來取得了驚人的經濟增長，在世界經濟史上，保持幾十年不間斷高速經濟增長是前所未有的，堪稱經濟奇跡。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在動蕩的國際環境裏，中國這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發展中國家採取了非常激進的發展戰略，深度融入資本主義全球經濟，但同時依然在意識形態上堅守「社會主義」。這一時期經歷了全球冷戰的結束、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崩潰，以及中美關係的跌宕起伏。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在1990年代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普遍出現了「轉型期衰落」(transitional

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並非只有正面效應：它既刺激了中國建立在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出口驅動的高速經濟增長；但同時在客觀上誘導中國企業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阻止其向技術階梯的高端升級，由此阻礙了中國的工業化。

decline)，中國則避免了這一現象。不僅如此，中國以加入WTO為標誌的深度全球化(deep integration)戰略，進一步加快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步伐。

當前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是「自由主義全球化」(liberal globalization)的最大受益者，其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就是明證；而且，中國本土企業正變得更大更強。這表明中國正在通過快速工業化迅速成長為一個經濟超級大國。這一觀點得到了廣泛呼應。經濟學家、歷史學家以及國際關係學者時下正在熱烈討論的一個中心話題是，相對於西方的衰落，中國已成為全球經濟新的重心，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的柯成興(Danny Quah)教授是這一觀點最積極的倡導者^①。這些學者預測，隨着全球實力中心從西方轉移到非西方，特別是從美國轉移到中國，一個新的霸權國家正在崛起。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外交與戰略研究中心(LSE IDEAS)主任考克斯(Michael Cox)教授是對時下盛行的「實力轉移論」(power shift)提出質疑的學者之一。他認為，儘管美國遭遇到嚴重的「短期問題」，但它依然擁有巨大的「基礎性結構優勢」；中國雖然正在經濟上快速崛起，但從實力的角度來看則還未真正崛起^②。實際上，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的一個共識是：儘管中國毫無疑問正在經濟上迅速崛起，但它崛起的方式存在問題，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亟待轉型^③。就本文而言，更為相關的問題是，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也並非只有正面效應：全球化既刺激了中國建立在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出口驅動的高速經濟增長；但同時又造就了一種格局，客觀上誘導中國企業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阻止其向技術階梯的高端升級，由此阻礙了中國的工業化。

本文將闡釋究竟是甚麼推動中國以一種極端方式加入WTO，至於中國入世後經濟奇迹的由來，以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負面效應，筆者將在另一篇專文予以詳細討論。

一 中國入世協定的主要內容

中國從1986年申請恢復WTO的前身——《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締約國地位，到2001年正式加入該組織，用了整整十五年時間。加入WTO是中國最高決策層做出的重大決定。根據WTO的有關協定，中國產品獲得了更多進入外部市場的機會，作為回報，中國同意大幅削減貿易和投資壁壘。但是，中國將在未來十五年內被認定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中國還接受了兩個其他WTO成員國從未答應的歧視性特別保障條款——特定產品過渡期保障機制以及紡織品保障機制。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級研究員拉迪(Nicholas R. Lardy)指出，美國專門針對中國產品設計的「WTO附加」(WTO-plus)條款違背了「WTO最基本的原則」^④。這些特殊的進口控制措施使得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極易受到主要貿易夥伴反傾銷措施的打擊。

不過，從總體上看，WTO有關協定的真正重心是放在投資自由化而非貿易自由化上。中國在1999年11月15日與美國達成的《中美市場准入協定》(Agreement on Market Access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承諾，在入世後立即實施《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以下簡稱TRIMs協定)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以下簡稱TRIPs協定)；並承諾不對外國投資者在當地含量(即國產化)、出口實績、外匯平衡，以及技術轉讓等方面施加要求^⑤。中國放棄對外資施加技術轉讓要求的做法令人驚訝，因為TRIMs協定本身並未限制成員國在這方面的經濟主權。中國還在〈中國入世工作組報告〉(“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China”)中承諾，將在入世後立即成為WTO《政府採購協定》(*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GPA*)的觀察員，並盡快啟動加入該協定的談判^⑥。

WTO的三大協定：TRIMs、TRIPs以及《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是發達國家以互惠(reciprocity)的名義強迫發展中國家大幅開放國內市場，同時阻礙發展中國家實施趕超的保障機制，其本質是一種「犧牲窮國利益的富國的保護主義」^⑦。其實，當時只有很少的一些WTO成員國表示接受TRIMs和TRIPs協定的約束，同時幾乎沒有幾個國家加入GPA，包括多數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國家^⑧。但對於新加入國家如中國來說，要取得成員國資格，則必須接受除GPA之外的WTO一攬子協定。

這些激進的自由化承諾遠遠超過了另一個發展中大國——印度在入世時所接受的條件^⑨，從而使中國成為了世界上最開放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市場開放度甚至超過了一些發達國家^⑩。不僅如此，為了增加入世承諾的可信度並使之不可逆轉，中國政府甚至在入世前夕，即本着「國際法優先於國內法」的信條，開始着手修改或廢止國內的法律和法規，以使其與WTO的規則完全一致，這就是所謂的「全球化附加」(globalization plus)。中國加入WTO過程的這兩項鮮明特徵：對外激進的經濟自由化承諾以及對內法律的「合規化」，正是中國在對外經濟關係上皈依新自由主義的明證。

諾蘭認為，中國加入WTO的歷史意義絲毫不亞於中國在鴉片戰爭後被強行打開國門。然而，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已然是一個大國，人們很難設想這樣一個大國會被輕易懾服。中國以慘重代價加入WTO，與其說是迫於外國壓力，不如說是自主選擇的結果。

二 入世的目的：「鎖定」經濟改革？

對於中國企業來說，入世是一場豪賭。這是因為，首先，儘管中國政府在入世前已在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上採取了實質性措施，但在入世談判中依然接受了比其他成員國苛刻得多的開放國內市場的條件。其次，就企業實力而言，中國企業在入世前與西方大企業相比，在任何方面都顯得虛弱不堪^⑪。可是，中國政府在入世談判中既沒有與本國企業協商，更沒有讓它們參與到談判之中。

劍橋大學發展經濟學教授諾蘭(Peter Nolan)用「巨人之戰，還是侏儒之敗」(Battle of the Giants or Defeat of the Pygmies?)，來形容中國企業與西方企業實力上的驚人差距。他認為，中國加入WTO的歷史意義絲毫不亞於中國在鴉片戰爭後被強行打開國門^⑫。這一看法不無道理。然而，這兩次大規模經濟開放的國際政治背景卻有着天壤之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已不再是帝國主義時代，而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已然是一個大國，人們很難設想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會被輕易懾服(假定它在談判中堅守自己的條件)。因此，中國以慘重代價加入WTO，與其說是迫於外國壓力，不如說是自主選擇的結果。

毫無疑問，中國一旦實行改革開放，加入WTO就勢在必然。問題並不在於中國為何要加入WTO，而在於在WTO提供的發展條件明顯要劣於GATT的情況下^③，作為低收入後發工業化國家 (late-industrializing country) 的中國為何還要迫不及待地加入WTO，並為此不惜接受比WTO所有其他成員苛刻得多的經濟自由化條件？如此激進的深度全球化是否必要以及必然？當中國領導人決定把整個國家投入這樣一場豪賭中時，他們的信心又從何而來？

眾所周知，時任中國總理朱鎔基在入世的重大決策上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他成功地使其他政治局常委相信，即將到來的入世衝擊「不會在經濟和政治上造成混亂」。朱的信念來自於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 的「忠告」。格林斯潘對朱說，「中國不應當懼怕競爭給中國受到保護的工業和金融部門帶來的挑戰。相反，即便國有企業倒閉，入世也將為中國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④於是，朱不顧產業界和一些部委的激烈反對，在談判中不斷做出重大讓步。同時，他又將格林斯潘的「競爭萬能理論」轉售給了政治局的同仁。據朱的老朋友、一位在北京的西方政治經濟觀察家龍安志 (Laurence J. Brahm) 的分析，朱的政治局同志給予了他決定性的支持，因為此一想法來自「一位深受崇敬的外國人」^⑤。

當時乃至今日的主流觀點把中國入世解釋為「改革者」要達到鎖定市場改革政策的目的。龍安志認為，朱鎔基主導下的市場取向的改革是一種「有管理的市場化」(managed marketization)，這一改革在中國加入WTO之前已取得了巨大成功。他認為，朱在1990年代推動的「有管理的市場化」已經把中國帶到了成熟市場經濟的邊緣，而競爭是中國改革日程表中唯一缺失的東西，現在，「有管理的市場化」圓滿完成的時機已經成熟，是時候把中國企業徹底推入到全球競爭之中了^⑥。換句話說，正是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年、特別是1990年代成功推行的經濟改革，自然而然地令中國更深地融入到全球經濟之中。

事實果真如此嗎？作為龍安志老朋友的朱鎔基看法恰恰相反。在中國入世僅僅十五個月後的2002年3月，朱與美國摩根斯坦利公司 (Morgan Stanley) 首席經濟學家羅奇 (Stephen Roach) 進行了一次坦率的談話，朱說，「假如中國不加入世貿，改革和維持經濟增長都將是不可能的。」^⑦從朱的語氣中，實在聽不出他對過去二十年改革成功的絲毫肯定。假如改革是成功的，中國為甚麼還要接受如此苛刻的入世條件？難道僅僅是為了「鎖定」改革？這樣做的代價是不是太大？為甚麼改革帶來的持續高速經濟增長絲毫沒有增加中國的談判籌碼，相反，卻令中國似乎無可選擇地被迫接受這樣一個「不平等條約」？如果說中國199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促進了經濟的快速增長，那麼，同樣的改革難道不也是愈益猖獗的腐敗、不斷擴大的兩極分化，以及經濟動力衰減的重要根源？

三 1990年代的中國經濟改革

要解答上述的疑問，關鍵的問題在於，中國1990年代改革的性質究竟是甚麼？另一個同等重要、但長期以來研究不足的問題是，中國這一時期的經濟實況究竟為何？這兩大問題其實是交織在一起的，對其加以剖析將為我們理解中國奇特的入世方式背後的政治動因提供線索。

假如1990年代的經濟改革是成功的，中國為甚麼還要接受如此苛刻的入世條件，難道僅僅是為了「鎖定」改革？如果說市場化改革促進了經濟的快速增長，那麼同樣的改革難道不也是腐敗、兩極分化，以及經濟動力衰減的重要根源？

本文不擬深入討論中國1980年代的經濟改革，只想提及一點：當時的經濟改革僅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到了1980年代後期，中國的經濟改革實際上已難以為繼，因為當時的改革並未觸及兩大關鍵問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這兩者長期以來一直被視作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象徵。問題是，如果不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進行系統化改造，任何孤立的改革措施都難以取得成功。一個典型事例就是1988年的價格改革，那樣的改革只會引發惡性通脹^⑩，而那次激進的「物價闖關」恰恰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經濟根源。

天安門事件和隨後蘇聯東歐集團社會主義政權的相繼崩潰，嚴重削弱了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因黨內保守勢力的公開抵制，以及美國發起的經濟制裁而陷入困境。但是，1989年在中國現代史上極端重要，這不單單是因為中共政權抵受住了蘇東共產主義崩潰的多米諾效應 (Domino Effect) 而倖存下來，更因為1989年的全球事件並不意味着中國改革開放的終結。這一切歸功於鄧小平。

1989年的全球事件發生以後，共產主義名譽掃地，鄧小平對此比任何人都有着更清醒的認識。在他看來，戈爾巴喬夫 (Mikhail S. Gorbachev) 的公開性 (glasnost) 無異於政治自殺，但重歸毛主義則等於否定改革開放，這將在政治上埋葬鄧；而且，即便強行向毛主義回歸，中共政權最終也難免重蹈拒絕變革的羅馬尼亞和東德斯大林主義政權的覆轍。

1992年是極為關鍵的一年。在三年「穩定」期 (1989-1992) 結束後，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最終提供不了能給中國帶來持久經濟繁榮的另類選擇，儘管他們成功地遏制了通貨膨脹。這就給鄧小平提供了反擊的機會。1989年全球事件的巨大衝擊使鄧得以向黨內左派徹底攤牌，以強力推動市場化改革。

鄧小平在1992年春的著名南巡講話中，對共產主義隻字未提。相反，他機會主義地提出了甚麼是社會主義的三大標準。用他的話說：只要能夠發展生產力、只要能夠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要能夠增強中國的綜合國力^⑪，這就是「社會主義」^⑫。他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也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⑬。由此，鄧把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建立在良好的經濟表現上。其實，把他的話顛倒一下，在邏輯上就能完全成立，那就是，只有經濟的發展才能確保中共的執政地位並加強其統治，從而挽救中國的「社會主義」。當然，鄧也有很強的個人動機，即通過推行更加激進的經濟改革來取悅知識份子，進而為其在天安門事件中的鎮壓決定正名。

問題是，就經濟自由化的程度而言，鄧小平的市場列寧主義模式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與匈牙利在1960至70年代推行的市場社會主義均存在很大差異；而且，1990年代的中國經濟改革也並非1980年代旨在完善社會主義的漸進式經濟改革的自然延續。在1980年代，當時的總理趙紫陽在推動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時，對社會公正比較重視^⑭。與之相反，1990年代的經濟改革則愈來愈偏離經典社會主義。它一味追求效率，而置社會主義傳統的平等原則於不顧。因此，1980年代與1990年代的改革路徑大相逕庭。但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所依賴的政治集權體制卻無本質變化，這種政治連續性體現為黨對權力的絕對壟斷。中國改革路徑的巨大變化，在很大程度上與鄧在全球共產主義崩潰的大背景下吸取天安門事件的教訓有關。

1990年代的經濟改革一味追求效率，而置社會主義傳統的平等原則於不顧。因此，1980年代與1990年代的改革路徑大相逕庭。但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所依賴的政治集權體制卻無本質變化，這種政治連續性體現為黨對權力的絕對壟斷。

在鄧小平的視野裏，中國高度政治化的經濟增長只能經由外部整合而非內部整合來實現，也就是實行外向發展戰略，充分發揮中國在廉價勞動力方面的比較優勢，通過增加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

鄧小平從天安門事件中得到的三大教訓是：決不能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用不着取悅人民、對外開放需要綏靖西方^②。這些對鄧在1990年代所推行的改革政策和發展戰略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鄧看來，中國人民在他的統治下日子要比在毛時代好過得多，但他們似乎並不對他感恩戴德，儘管1980年代的改革令絕大多數人受益；他們既想要社會主義的平等，也想要資本主義的財富。可這對於任何政治家來說，都是難以實現的使命——想想戈爾巴喬夫的結局。因此，黨必須牢牢掌握政權，在此前提下，通過強力推動效率優先 (efficiency-biased) 的改革，實現經濟的持久繁榮，以此重建黨的執政合法性。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改革、經濟增長與政權合法性之間的密切關聯。但是，改革只是經濟增長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經濟增長還需要通過適當的發展戰略來實現^③。中國的獨特性在於，它既是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大國。因而，相對於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有着更多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選擇。然而，在鄧小平的視野裏，中國高度政治化的經濟增長只能經由外部整合 (external integration) 而非內部整合 (internal integration) 來實現，也就是實行外向發展戰略，充分發揮中國在廉價勞動力方面的比較優勢，通過增加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

英國發展經濟學家魏德 (Robert H. Wade) 在研究東亞經濟成長模式時對這兩種整合方式進行了區分。他指出，「內部整合對國家經濟發展的意義要大於外部整合。」一個高度內部整合的經濟體要求「國內產業部門之間建立起密切的關聯」，這是國家自主發展的基礎；在政治上，高度內部整合還可能導致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建立起牢固的聯盟，因為工資不僅僅是生產成本，也是消費的來源。因此，在高度內部整合的經濟體中，「出口需求並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消費需求^④。對於內部整合度較低的經濟體來說，情況則剛好相反，工資「僅僅被視為成本，而非消費的來源」。由於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出口，國內產業部門之間的聯繫必然鬆散，以至為外國市場生產產品的部門與國內市場相互隔離；這樣的經濟體也「沒有形成階級聯盟和民主政權的基礎」^⑤。不過，魏德認為，內部整合與外部整合並非完全互斥，恰當的國家發展戰略應介於兩者之間，使其「彼此促進而非相互削弱」。因此，對於後發工業化國家來說，最佳的發展戰略是把「比較優勢原則與進口替代原則結合起來」^⑥。這正是1970至80年代東亞發展型國家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的成功之道。

鄧小平顯然受到了「東亞模式」、特別是戰後日本經濟奇迹的啟發，但他對東亞模式的看法相當幼稚。而且，他對於冷戰的政治經濟學也全然無知。他認為，中國只要實行對外開放並保持與美國的友好關係，就能夠實現經濟繁榮^⑦。鄧沒有意識到，東亞模式之奏效得益於冷戰，美國的冷戰政策所造就的極其有利的國際條件是東亞國家和地區 (日本和「四小龍」) 所特有的，這些條件無論在冷戰期間還是在冷戰結束後，均無法在其他地方再現。而美國亦無意幫助共產黨中國建成另一個德國或日本那樣的工業強國，即便是在1970至80年代美國基於安全原因與中國建立的同盟關係相當牢固的時候^⑧。然而，鄧對中國的前景有着自己的展望，他急切期望取得立竿見影的成效。在他看來，要想取得更快的經濟增長，惟有實行更加激進的市場化改革以及大規模的外部整合。

天安門事件後，將政權合法性建立在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實用原則基礎上，預示着中共政權性質的改變。經濟增長的高度政治化必然導致市場化改革過份偏重效率，而不再顧及工人和農民的利益，這體現在1992年後工人和農民

在經濟和政治地位的迅速邊緣化上。在市場化改革中，為了追求效率，國有企業職工在未得到合理補償的情況下被大批裁減；在農村地區，「三農」問題開始浮現，農民負擔愈趨沉重，農村的貧困化日益嚴重。工人和農民成為了中國市場化進程中的最大輸家——「被剝奪者」。

由於市場化改革的政治驅動力不再來自早已失去感召力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而是來自制度化尋租，亦即權錢交易的機制，處在意識形態真空中的黨國官員遂不遺餘力地創造市場。在權力不受任何制約的情況下，市場化改革必然導致腐敗迅速蔓延。這一過程究其本質是官僚集團率先為其自身牟利的「受操縱的市場化」(manipulated marketization)，而不是國家管制市場意義上的「有管理的市場化」。它的目標指向非常明確——「化公為私」，推進的手段也非常激進，並非西方所理解的「漸進改革」或「有管理(有序)的市場化」。一方面，權貴集團以空前規模直接介入經營活動，通過壟斷高盈利部門成為巨富階層^⑩；另一方面，在國家自上而下強力推進的國有企業改革進程中，許多黨組織委任的國企管理者以所謂「戰略重組」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名義，通過「內部人」將企業巨額資產據為己有^⑪，成為名符其實的「剝奪者」。

中國一些自由派經濟學家竭力為這種不正義的腐敗的市場化改革背書，說甚麼「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⑫。到1990年代中期，政治精英與由幹部轉化而成的商業精英之間的聯盟日漸成型，這一聯盟極大地鞏固了現政權。那個時期出現的一本著名政治小說《天怒》暢銷一時，但此書出版後不久即遭到封禁。在書中，一位腐敗高官狂妄地宣稱，「腐敗使我們的政權更加鞏固」^⑬。這種「受操縱的市場化」改革為中國官僚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⑭的興起打開了方便之門，而這恰恰是1990年代中國收入差距迅速擴大，以致內需不振的制度根源。

四 1990年代的中國發展

中國在1990年代的工業發展情況如何？對於後發工業化國家來說，發展必須通過「強國家」推動內部整合來實現。而內部整合涉及兩大方面：一是對工人權利以及本國幼稚工業提供制度性保護；二是理順中央和地方關係，建立統一的國內大市場，以實現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鑒於中國巨大的經濟規模和市場潛力，建立在高度內部整合基礎上的經濟發展無疑將減少中國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增強中國對發達國家討價還價的能力，使中國(至少在理論上)能夠以較低代價從後者獲得先進技術，從而大大提高中國趕超的效率和成效。

中國本來完全有可能實現內部整合，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具有大國地位和「帝國」的規模，還因為內部整合與中國一貫強調的社會主義平等原則，如保障就業和公平分配財富等，是直接相關和完全相容的。但是，1989年後突變的中國及全球政治形勢，特別是1992年後中共政權性質的改變，排除了將社會主義原則與市場改革結合起來的另類選擇。

前文提到，鄧小平自1992年起決心通過促進出口來取得經濟的高速增長。從那時起，這一原則便統攬了中國的發展戰略。這裏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啟動不久，就受到國際體系要求實施經濟自由化的沉重壓力，這一與日俱增的體系壓力主要來自美國及其控制下的國際組織^⑮。1990年代是新自由主義

中國本來完全有可能實現內部整合，因為內部整合與中國一貫強調的社會主義平等原則是直接相關和完全相容的。但是，1989年後突變的中國及全球政治形勢，特別是1992年後中共政權性質的改變，排除了將社會主義原則與市場改革結合起來的另類選擇。

全球化的黃金時期。1992年10月，中美就市場准入達成協議，簽訂《中美市場准入諒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cerning Market Access)。中國同意削減貿易壁壘，以換取美國繼續保留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但是，中國在美國的壓力下還做出了另一項重大讓步，這一讓步對中國的長期發展命運攸關，那就是中國同意「不對任何產品實行進口替代」。

進口替代是工業化的基礎，放棄進口替代意味着中國對外部經濟力量的國家自主性受到了削弱。為彌補這部分喪失的經濟主權，中國政府於是期望外國投資者，尤其是來自西方工業化國家的跨國公司向中國轉讓技術。這就是所謂的「以市場換技術」戰略的真正由來^⑨。為此，中國政府修改了有關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法律，放寬了對外資股權比例以及投資地域的限制。新法律還允許外資方在合資公司裏出任董事長，並允許外國公司在中國設立全資子公司。

中國「以市場換技術」為核心的外部整合發展戰略就是在刺激出口的同時，對外資實行大規模開放。這是非常奇怪和不可思議的，因為真正意義的出口導向工業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戰略是將出口促進與進口替代結合在一起的^⑩，也就是通過鼓勵出口及保護國內的市場和企業，建立起本國獨立自主的強大工業能力。「以市場換技術」表明中國政府缺乏自主發展的堅定意志，相反，它把本國現代化的希望寄託於外國投資者的技術轉讓。台灣學者瞿宛文認為，「以市場換技術」的實質是中國政府變相實施進口替代^⑪。情況或許如此，但問題是，這一辦法能夠奏效嗎？

「以市場換技術」戰略實施的結果是，自1992年開始，在中國的外資數量激增。與以往「兩頭在外」、不與本土企業爭奪國內市場的港澳台資本不同的是，這一輪外資主要來自西方工業化國家。但是，西方跨國公司投資中國的主要動機是進行市場控制，而不是幫助中國擴大出口，它們把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視為主要競爭對手。出乎中國官員意料的是，這些跨國公司並沒有把先進技術轉讓給中國夥伴，因為它們不願意培植未來的競爭對手。不僅如此，跨國公司還竭力防止技術洩露，以保持對中國企業較大的技術優勢。與此同時，外商獨資企業的數量猛增，並很快取代合資企業成為在華FDI的主要形式，中國企業愈來愈難以從跨國公司獲得最先進的技術，它們通過技術許可協議等方式所獲得的大多是在跨國公司母國已經過時、但對於中國來說依然適宜的技術^⑫。

保守技術秘密是跨國企業全球通行的做法，這本身並不奇怪。對於中國來說，值得反省的不僅僅是中國政府在心理上對外資技術轉讓的嚴重依賴和一廂情願，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始終未能設計出一整套恰當的國家產業振興方針，以促進國內企業對引進的技術進行系統的消化、吸收和再創新。

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János Kornai)指出，社會主義體制具有「強制增長」(forced growth)的內在壓力^⑬。天安門事件造成的政權合法性焦慮令「強制增長」的體制壓力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被進一步放大。因此，通過「以市場換技術」的發展戰略強制經濟增長，意味着東亞發展型國家那種以自主振興和趕超為目標所實施的產業政策不可能施行於中國。事實上，中國政府不但從未出台過全國性的產業政策以指引國家的工業化，而且，唯一於1994年在汽車產業推出的產業政策也不鼓勵本國企業的創新活動，而是一味依賴技術引進，並把產業升

真正意義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是將出口促進與進口替代結合，也就是通過鼓勵出口及保護國內的市場和企業，建立起本國獨立自主的強大工業能力。「以市場換技術」表明中國政府缺乏自主發展的堅定意志，它把本國現代化的希望寄託於外國投資者的技術轉讓。

級的希望寄託於和跨國公司合資經營。這與普遍抗拒合資形式、堅持本土企業自主性的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發展戰略形成了鮮明對比^④。

值得注意的是，過度依賴技術引進是中國產業的普遍現象，非汽車產業所獨有。這種過度依賴表現為，作為技術引進主要載體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普遍不重視對引進的技術進行消化和吸收。據報導指出，「2003年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的比例僅為1:0.07，日、韓兩國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的比例均保持在1:10左右。」^⑤這必然導致本國企業創新能力嚴重低下，對技術引進形成持續性的依賴。

出口促進與市場開放（尤其是對外資大規模開放）並舉，表明中國實施的並不是典型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外資的大量湧入雖然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卻沒有促進國有企業技術上的顯著進步^⑥。相反，在外資的巨大競爭壓力下，國企面臨空前的生存壓力。然而，開放的「政治正確」促使受到「唯增長是舉」績效考核壓力的地方各級政府競相招商引資，為外國投資者提供種種政策優惠，這反過來加速了國企經營狀況的惡化。不僅如此，與「以市場換技術」戰略幾乎同步實施的所謂「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則進一步從整體上削弱了國企，從而背離了以現代化為指向的國家發展目標。

所謂「抓大放小」，就是國家對大型國企實行壟斷化；同時，為了卸下財政包袱，又刻意拋棄大批不盈利的中小型國企。其結果是，改革與開放在最壞的條件下相互作用，令大批國企在競爭中破產倒閉。大型國企在國家的鼎力扶持下規模持續膨脹，但是，在「強制增長」和「黨管幹部」的制度約束下，國企很難產生強大的創新動力；與此同時，在經濟聯邦制結構下，地區間產業嚴重雷同又造成生產能力的大量閒置，國企因而始終「大而不強」，毫無國際競爭力可言^⑦。相反，外資則佔盡了優勢，到199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對中國市場的控制^⑧。國有企業是中國正規製造業的基礎，但國企的低效使其從根本上難以承擔國家自主振興的重任。問題是，在私營企業在意識形態和政策上依然受到重重限制、乃至排斥的1990年代，國企的衰落意味着中國自主發展的基礎受到了嚴重削弱。

1996年，國有企業首次出現全行業虧損，不得不大量裁員；此時，虧損累累的國企給國有銀行帶來的巨額不良貸款，已積累到危及國家金融穩定的地步，中國政府遂不得不默許地方政府大規模的「自發的私有化」運動。中國的集權體制決定了這種「自發的私有化」必然是「權貴私有化」，而權貴私有化真正的獲益者自然是那些「內部人」。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尤素福 (Shahid Yusuf) 等人對中國的私有化現象進行了深入考察，得出的結論是，中國這種由國家強力推動的私有化，無論在宏觀還是微觀上，都沒有顯著提高中國的經濟效率^⑨。

國有企業大規模裁員以及制度性腐敗導致收入差距迅速擴大。1999年，中國的基尼系數 (Gini Coefficient) 已高達0.457^⑩，中國成為了全球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這直接導致消費不足和需求的相對萎縮，中國經濟因而不得不更加依賴出口以維持高速增長。與此同時，由於外資對國企的替代效應令中國的產業和就業結構惡化，因此經濟增長又不得不進一步依賴外資。在這點上，筆者不贊成諾蘭教授的看法。他認為，1990年代大型國企取得了顯著的產業進步，從而使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資的國家^⑪。但事實是：儘管國企的絕對規模在1990年代不斷擴大，其工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 (GDP) 的比重卻持續下降；相反，同期外資所佔比重卻持續增長。國企的相對衰落導致中國工業化在整個1990年代徘徊

國有企業是中國正規製造業的基礎，但國企的低效使其從根本上難以承擔國家自主振興的重任。問題是，在私營企業在意識形態和政策上依然受到重重限制、乃至排斥的1990年代，國企的衰落意味着中國自主發展的基礎受到了嚴重削弱。

表1 1990年代中國工業增加值及工業化率 (單位：%)

企業 年份	A 外資企業	B 採掘及原材料工業	C 國有企業	D 私營和集體企業	E 工業化率
1992	5.5	26.9	42.1	25.5	18.4
1994	8.5	26.6	40.8	24.1	20.4
1996	9.8	21.5	30.7	38.0	17.4
1998	12.2	20.1	25.9	41.8	16.2
2000	15.4	22.3	26.5	35.8	18.5

註：E = (A + C) / GDP

資料來源：程曉農：〈重新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與結果〉，《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1期，頁39。

中國深度融入全球經濟並非1990年代「經濟成功」的自然結果；恰恰相反，中國在1990年代改革和發展兩方面均遭遇到嚴重困境，迫使中國政府不顧一切加入WTO，以維持經濟增長。

不前(表1)⑨。到1998至1999年時，中國經濟已漸漸遠離繁榮，在東亞金融危機、內需低迷以及洪水災禍的三重打擊下，正迅速滑向衰退的邊緣。正因為中國經濟前景黯淡，FDI總額自中國1978年實行開放以來首次出現大幅下滑(表2)。

中國政府對FDI總額的下降十分敏感，同時也意識到經濟轉型的重要性，於是付出了諸多努力來刺激內需。然而成效甚微，這些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措施在中國的集權體制下只會帶來更嚴重的腐敗和投資浪費。那麼，對於篤信實用主義原則的中國領導人來說，合乎邏輯的唯一解決辦法就是增加出口，同時竭盡全力吸引外資。但這需要中國支付對價，對外國商品、服務和資本大規模開放國內市場。這種交換既是冷戰後的國際政治以及美國一貫的對華戰略使然，也是中國國內政治的內在要求——中國需要維持經濟高增長。

表2 1990年代經濟增長率、外國直接投資(FDI)及資本外逃總額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GDP增長率(%)	14.2	13.5	12.7	10.5	9.6	8.8	7.8	7.1	8.0
FDI(億美元)	110.07	275.15	337.67	375.21	417.26	452.57	454.63	403.19	407.72
資本外逃(億美元)	—	—	—	—	—	364.74	386.37	238.3	480

資料來源：GDP增長率及FDI數據綜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及原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網站的統計資料；資本外逃的數據來自〈中國已成為全球第4大資本外逃國〉(2001年8月2日)，中國宏觀經濟信息網，www.macroeconomy.com.cn/zhzt/000086/006/20010731014935.shtml。

中國領導人也的確有充足的理由對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邏輯深信不疑，因為正是1990年代中期以來出口劇增以及外資的大量湧入，中國經濟才得以在通貨緊縮以及大規模資本外逃的陰影下繼續保持相對高速增長(表2)。於是，全球化的這些正面效應促使中國領導人決定以更大的規模把中國融入全球經濟，作為扭轉經濟頹勢的唯一途徑，以此解決他們壓倒一切的政權合法性憂慮。這就是中國加入WTO背後的政治理性。換言之，中國深度融入全球經濟並非1990年代「經濟成功」的自然結果；恰恰相反，中國在1990年代改革和發展兩方面均遭遇到嚴重困境，迫使中國政府不顧一切加入WTO，以維持經濟增長。

註釋

- ① Danny Quah, "The Global Economy's Shifting Centre of Gravity", *Global Policy* 2, no. 1 (2011): 3-9.
- ② Michael Cox, "Power Shifts, Economic Chang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6, no. 4 (2012): 369-88.
- ③ 參見蒲彩、曾濤濤：〈2012天津夏季達沃斯論壇：張維迎、林毅夫、李稻葵激辯中國經濟未來走勢〉（2012年9月11日），人民網天津視窗，www.022net.com/2012/9-11/503256213025531.html；于春輝：〈中國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文匯報》，2012年11月26日；吳敬璉：〈中國在世界經濟變遷中面臨的挑戰（實錄）〉（2012年12月15日），三亞·財經國際論壇，<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2-12-15/112365258.html>等。
- ④ 參見Chi-chu Tschang, "WTO Accords Not without Dang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 August 2012。
- ⑤ 參見 *Agreement on Market Access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5 November 1999, <http://ia600306.us.archive.org/21/items/AgreementOnMarketAccess/Us-chinaBilateralAgreementProtocols.pdf>。
- ⑥ 參見 "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China", 1 October 2001, www.cecc.gov/pages/selectLaws/WTOimpact/wkptrptPRCWTO.php。
- ⑦ Peter Nolan,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National Champions,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Big Business Revolution* (New York: Palgrave, 2001), 139-55; Robert H. Wade, "Introduction to the 2003 Paperback Edition: Creating Capitalisms", in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xlv.
- ⑧ Nicholas R. Lardy,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80, 101.
- ⑨ 另一個新興經濟體——俄羅斯，雖然加入WTO的過程（1993-2012）比中國耗時更長，但它早在2002年即已被美國和歐盟承認為「完全市場經濟國家」。
- ⑩ 印度、美國、德國、英國、日本和法國均為市場開放度低於中國的發達國家。參見Deloitte Research UK, 2005。
- ⑪⑫⑬ Peter Nolan, "China and the 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6, no. 1 (2002): 119-37.
- ⑭ Robert H. Wade, "What Strategies Are Viabl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day?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he Shrinking of 'Development Spa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0, no. 4 (2003): 621-44.
- ⑮⑯⑰ Laurence J. Brahm, *Zhu Rongji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Singapore: John Wiley & Sons [Asia] Pte. Ltd., 2002), 263; 264; 279.
- ⑱ Stephen Roach, "China: Straight Talk from Zhu", 27 March 2002, www.morganstanley.com/GEFdata/digests/20020327-wed.html.
- ⑲ Cheng Xiaonong, "Decision and Miscarriage: Radical Price Reform in the Summer of 1988", in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ed. Carol Lee Hamrin and Suisheng Zhao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189-206.
- ⑳ 參見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372。
- ㉑ 鄧小平在1980年代某次外事會見中，公開對來訪的非洲國家領導人講了如下這段話，「我勸你們現在不要搞社會主義」；「我建議你們集中精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只要經濟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滿意了，叫甚麼主義都可以！」這段「政治不正確」的話自然不可能被收入《鄧小平文選》。參見杜導正：〈今天怎樣看待鄧小平？〉，《財經》，2008年12月5日。
- ㉒ 鄧小平：〈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11。
- ㉓ 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

- ⑳ Yue Jianyong, "Dilemma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Globalization—The Politics behind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Ph.D. dis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11), 134-39.
- ㉑ Dani Rodrik,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he Next Century", August 2001, www.eclac.cl/prensa/noticias/comunicados/6/7616/DaniRodrik29-08.pdf.
- ㉒⑳㉑ Robert H. Wade, "Introduction to the 2003 Paperback Edition", in *Governing the Market*, vlviii; vlviii; i.
- ㉓ 李嵐清：《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58；趙可金：〈美國沒其他列強壞是事實〉，《環球時報》，2012年1月18日。
- ㉔⑳④ 岳健勇：〈中國模式的神話——市場列寧主義與全球資本主義的聯姻〉，《領導者》，2011年第3期，頁23；22-23；17-18。
- ㉕ 這在相當程度上與權貴集團對政權一朝傾覆的恐懼心理有關。曾經在1980年代擔任過中國政府智囊的經濟學家羅小朋回憶道：「一位人士告訴我，六四之後〔鄧小平次子〕鄧質方曾親口對他說，『以前還真沒有想到要搞錢，現在不搞不行了。』」參見羅小朋：〈黨天下的總理難題——獻給2012和中共18大〉（2012年8月24日），縱覽中國，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7301。
- ㉖ 何清漣：《中國現代化的陷阱》，最新修訂本（San Diego〔聖迭戈〕：博大出版社，2003），頁347。
- ㉗ 參見〈序言：火山口上的中國〉，載何清漣：《中國現代化的陷阱》，最新修訂本，頁29，註釋2。
- ㉘ 方文：《天怒》（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7）。
- ㉙ 黃亞生的說法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參見Yasheng Hua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㉚ 一般認為，「以市場換技術」是源於1980年代中國汽車產業因外匯和資金短缺，難以大規模進口技術，於是採用了合資合作的方式，以期從外國合作夥伴那裏獲得先進技術。參見〈中國汽車產業的「市場換技術」〉（2006年2月15日），中國汽車動態網，www.chinaauto.net/huiyi/200621510456/news/2006215182938.htm。
- ㉛ Alice H. Amsden, *The Rise of "The Rest": Challenges to the West from Late-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36-38.
- ㉜④ 瞿宛文：〈超趕共識監督下的中國產業政策模式——以汽車產業為例〉，《經濟學（季刊）》，2009年第2期，頁501-32。
- ㉝ 陳漫：〈中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實效分析〉，《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3期，頁93-103；陳漫、岳健勇：〈出讓市場換來了技術進步？——對中國引進外資策略的分析〉，《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4期，頁93-100。
- ㉞ Já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107.
- ㉟ 參見〈中國汽車產業的「市場換技術」〉。
- ㊱ 程曉農：〈繁榮從何而來——中國經濟現狀與趨勢的分析〉，《開放時代》，2000年第9期，頁5-24。
- ㊲ 岳健勇：〈不容樂觀的工業化前景〉，《讀書》，2004年7月號，頁140-43。
- ㊳ Shahid Yusuf, Kaoru Nabeshima, and Dwight H. Perkins, *Under New Ownership: Privatizing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㊴ 孫立平：《轉型與斷裂：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272。
- ㊵ 程曉農：〈重新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與結果〉，《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1期，頁39-40。

岳健勇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博士，先後執教於倫敦國王學院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